

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的社会风险及其治理研究

郑金鹏

(山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会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力、破坏应对危机的社会动员力、损害党和政府的政治公信力,给国家治理带来严峻挑战。分析疫情中谣言生成传播的动因,个体心理需求是疫情谣言生成传播的根本原因,信息不对称是疫情谣言生成传播的直接原因,现代媒介环境是疫情谣言传播的间接原因。针对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的社会风险,提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重大疫情防控舆论导向,提高社会应急动员能力、防范化解谣言引发社会风险,加快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提升现代媒介治理水平的治理思路。

关键词:重大疫情;谣言;社会风险;国家治理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21)06-0020-07

新冠肺炎重大疫情暴发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全面开展疫情防控,掀起新时代抗“疫”的人民战争。在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波及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谣言的滋生和传播容易干扰人民群众视听,遮蔽事件事实真相,扰乱社会公共秩序,造成社会恐慌混乱,危害国家公共安全。正确评估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的社会风险,科学分析重大疫情中谣言的生成传播动因,采取有效措施做好疫情防控,阻断谣言传播,化解社会风险,对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总体战和人民战争,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的社会风险

当代社会已经成为风险社会,自从贝克《风险社会》一书出版以来,对风险社会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的热点。庄友刚指出:“在全球风险社会语境中,我国社会不可避免地构成了全球风险社会的一个部分。”^[1]伴随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愈来愈强,创造的财富日

益丰富,但与之而来的风险也呈几何级递增。正确认识风险、提前预估风险、积极规避风险、有效治理风险成为现代国家、社会和个体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新冠肺炎重大疫情暴发后,最首要的工作是抓好疫情防控,妥善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类矛盾和问题。但是,作为次生灾害,重大疫情中谣言和虚假信息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也不容小觑,要引起高度重视。

1. 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力

重大疫情防控是一项牵扯层面广、涉及环节多、关乎任务重的系统工程,需要全民动员和全社会参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2]团结产生凝聚力,面对重大疫情,只有充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情感共鸣,引导公众形成思想共识,才能凝聚起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强大精神力量。面对疫情发展的严峻形势,无数“平凡英雄”逆向而行、无私奉献,用实际行动投入一场全民动员、共同抗疫的人民战争,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

收稿日期:2021-08-23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21CKSJ03)。

作者简介:郑金鹏(1982—),男,山东泰安人,讲师,博士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力和社会凝聚力。但是,重大疫情暴发以来,各地哄抬物价、发国难财、地域歧视等新闻也频频见诸报端,涉及病毒来源、防控措施、传播途径的谣言和虚假信息在网络上屡见不鲜,它们通过网络自媒体等渠道以比病毒传播更快的速度传递给公众,给公众带来无端恐惧。面对重大疫情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公众个体非常容易产生恐慌情绪,对捕风捉影得来的消息失去判断力,一旦此种心理在人与人之间产生情绪共振,就会成为“谣言制造者”的帮凶,一方面这会消解和损耗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力,麻痹公众精神意识,制造恐惧紧张氛围,产生网络舆情漩涡,甚至对长期坚持的理想信念产生怀疑和否定。另一方面,公众获取的迷茫、焦虑、困惑情绪信息越多,就越容易“被放大、传播、升级,特别是一些政治谣言经过非法政治势力的运作,产生强烈的政治冲击力,甚至引发政治风波”。^[3]从此次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的情况来看,疫情中的谣言从最初仅涉及病毒本身的讨论,逐渐转向对主体责任的追究,甚至一度涉及国家体制和社会制度的探讨,并试图在舆论上将矛头引向党和政府,诱导网民产生负面情绪,意欲在理论、道路和制度上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政府和相关部门不能及时主动发声、迅速阻断谣言、加强正面引导,将造成比疫情本身更为严峻的谣言和虚假信息的传染效应,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巨大破坏,导致思想混乱,甚至引起社会动荡。

2. 破坏应对危机的社会动员力

社会动员历来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民力量、整合社会资源、集合群众智慧进而实现既定目标的有效手段,也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在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一种被实践反复证明十分有效的社会组织方式。面对重大疫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领导和统一部署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坚持全国上下一盘棋,全力动员社会各方资源投入战“疫”,聚合各方力量联防联控,在中国大地上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总动员。此次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社会动员兼具强制性和号召性,按照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推进,基本实现全员动员、全社会动员。此次疫情因受关注度高、影响力大,成为谣言和虚假信息竞相“蹭热度”的目标,谣言对社会动员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分散

人民群众防疫抗疫注意力,削弱社会动员效果。有的疫情谣言惯于用“危言耸听”的标题或语句来博取眼球,有的打着“普渡众生”“悲天悯人”旗号愚弄公众,还有的“指鹿为马”“颠倒黑白”,这些谣言掺杂在海量疫情信息中传播,想要准确辨别确需花费一番精力,无形中消耗人民群众防疫抗疫斗争的宝贵精力,直接影响社会动员效果。二是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破坏社会动员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立与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有序推动复工复产,使人流、物流、资金流有序运转起来,畅通经济社会循环。”^[4]近几年,干扰和影响经济社会正常秩序的谣言层出不穷,其目标从鱼肉到蔬菜,再到冷冻食品,几乎无孔不入,严重影响和干扰人民群众正常生产生活。此次重大疫情中,类似“苏州一企业提前开工员工确认感染,隔离200余人”等谣言,在激起民众恐慌的同时,直接或间接对企业复工复产、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等都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阻碍社会生产生活的有序恢复。

3. 损害党和政府的政治公信力

马克·吐温曾说过:“谎言跨越半个地球的时候,真相还在穿鞋”,十分形象地说明了在谣言应对中辟谣工作普遍存在的滞后性。“‘后真相’时代,社群和圈子成为谣言传播的基本单元,情感要素成为谣言传播的基本动力,传统的基于个体传播、事实诉求的辟谣手段的效力在不断消解。”^[5]能否让公众第一时间从政府和权威媒体获取可靠信息,让事实真相尽量早、多、快地传递开来,已成为考验各级党委政府治理智慧和治理能力,保持政治公信力的重大现实课题。乌尔里希·贝克指出:“全球风险社会各种灾难在政治层面上的暴发将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全球风险社会的核心涵义取决于大众媒体,取决于政治决策,取决于官僚机构,而未必取决于事故和灾难所发生的地点。”^[6]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时期,许多深层次问题和矛盾日益凸显,社会中长期积蓄的一些不满情绪和负面情绪容易转化为针对党和政府的谣言,对党和政府政治公信力构成威胁,带来信任危机。弗朗索瓦丝·勒莫指出:“谣言是对失衡或社会不安状况的一种反应。”^[7]重大疫情暴发以来,针对疫情的谣言呈现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受关注度高、危害性大等特点,这些谣言通过微博、微信、社交网站、网络论坛等网络介质散布或传播,强烈刺

激公众的脆弱神经。如果谣言传播不能被及时阻断或遏制,深陷谣言包围的公众会萌生“宁可信错,不可错过”的从众心态,使“不信谣、不传谣”的倡议成为空谈,必然削弱党和政府权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疫情中部分谣言将矛头指向个别政府部门和相关官员,一方面会给公众造成党委政府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失控”、执政能力不足的错觉,另一方面也会引发公众对政府在试图“隐瞒”真相,甚至“欺骗”“愚弄”公众的误导。此两者如果交互作用,极有可能会将公众引向党和政府的对立面,甚至催生对抗情绪,形成“塔西佗陷阱”风险。

二、重大疫情中谣言的生成传播动因

按照奥尔波特的研究,谣言是一个“与当时事件相关联的命题,是为了使人相信,一般以口传媒介的方式在人们之间流传,但是却缺乏具体的资料以证实其确切性。”^[8]它的生成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第一,故事的主题必须对传谣者和听谣者有某种重要性;第二,真实的事实必须用某种模糊性掩盖起来。由于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2003年“非典”疫情谣言传播形势相比,新冠肺炎疫情谣言的滋生数量、更新频率和覆盖范围更多、更快、更广。深入剖析重大疫情中谣言生成传播的动因,有利于及时掐灭谣言传播源头,有效阻断谣言传播途径,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创造良好环境。

1. 个体心理需求是疫情谣言生成传播的根本原因

任何谣言都是应个体心理需求而产生的。“谣言产生与流传的先决因素,都取决于个体的‘主观’感知而非‘客观’事实。有些事件,尽管从客观上来说并非重大事件,但如果个体主观卷入程度、主观感知到的不确定程度、主观体会的焦虑程度都很高的话,仍然会催生谣言。”^[9]重大疫情关乎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公众会因疫情信息牵涉个人安危而形成负面恐慌情绪和安全心理需求,这些情绪和心理需求具有强大的冲击力,是重大疫情中谣言生成传播的根本原因。分析来看,一是人类趋利避害的天然本性。作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对公众个体具有相当大的威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普通民众一般缺乏极端情况的风险应对能力,在风险规避方式选择上容易被谣言所呈现的低成本模式诱导。事实上,谣言确

实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消除公众疑虑和缓解个体紧张的作用。^[10]在此种情境下,个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就是一种有着理性色彩的风险规避选择。二是大众恐慌引起的从众心态。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指出:“让群体相信什么,首先得搞清楚让他们兴奋的感情,并且装出自己也有这种感情的样子,然后以借助于初级的联想方式,用一些非常著名的暗示性形象,去改变他们的想法”。^[11]面对重大疫情,社会公众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对新冠病毒的恐惧心理成为影响个体判断能力的重要因素,这为谣言制造者歪曲事实、传播谣言创造了条件。作为社会个体来讲,面对每天网络上铺天盖地而来的疫情信息,人们短时间很难分辨真假,只能时刻保持“刷屏”状态,通过复制、转发为自身的恐慌情绪寻找宣泄口,从而不自觉地被裹挟参与到“集体无意识的狂欢”之中。三是公民素质存在个体差异。“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实现人的现代化需要培育现代化公民”,^[12]尽管有着五千年历史文明的涵养和百年的现代文明洗礼,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当代中国人的公民素养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囿于知识水平、价值观念、教育背景等因素的影响,人们对待事物的认知、态度千差万别。重大疫情发生以来,我们目睹某些奸诈之徒哄抬物价、大发国难财,也看到危难之际抱头鼠窜的卑鄙之辈和制造谣言、编造谎言的跳梁小丑。我们也见证了“天使”们白衣执甲、逆向而行,“英雄”们星夜兼程、千里驰援和“国土”们无惧生死、共赴国难的精神气概。针对疫情谣言,最高人民法院一篇谈谣言问题的文章指出:“不同个体基于认知水平的差异,对同一事物,完全可能产生不同程度的虚假信息,我们应该理解法律对个体的适度宽容态度。”^[13]从法律层面就谣言产生和传播的受众视角作出了权威解释。作为谣言传播的受众,部分公众因个体知识不足或经验缺乏,轻易被虚假信息蒙蔽,情有可原,但是对于恶意制造和传播谣言、企图扰乱公众视听的不法之徒,还是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不令其有可乘之机。

2. 信息不对称是疫情谣言生成传播的直接原因

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抽查”,是对国家、政府、社会和公众的综合考验。事实证明,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努力,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取得决定性成果,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新冠肺炎疫情大规模暴发也深刻暴露了我国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还存在短板和不足,特别是谣言的滋生传播说明在疫情防控中,各防疫抗疫主体的信息不对称现象还普遍存在。第一,主体责任不清晰。截至目前,导致此次重大疫情的责任主体尚无最终结论,公众舆论在不知将责任推向何处时非常容易“错误地将疫情源发地的民众视为直接责任主体进行攻击”。^[14]第二,信息公开有疏漏。疫情暴发初期,正值春节假期,人员流动范围广,短时间阻断病毒传播难度大,联防联控措施一时无法发挥作用,个别地方政府在开展疫情防控时重视程度不够,思想上麻痹大意、行动上拖沓迟缓,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顽疾不改,甚至出现瞒报、谎报,造成疫情信息发布渠道不通畅,为谣言传播扩散提供了便利。另外,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疫情,从政府到专家再到普通民众,相关各方注意力都相对集中在救助病患、研究病毒和维护稳定上,对信息公开和回应公众诉求等稍有疏漏迟缓都会给谣言可乘之机。第三,公众认知受局限。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公众对新型冠状病毒知之甚少,从媒体获取的消息也反复强调该病毒“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人群普遍对它没有免疫力”“没有特效药可以有效应对”,专家给出的答案也是尚未明确感染源。这一系列“未知”和“不确定”很容易“使人失去了对真理的把握,从而失去对客观世界以及自我的控制力,也就是一种能动性的丧失”,^[15]从而产生“疫情不可控制”的焦虑和恐慌。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网络全媒体时代,此种情绪通过网络的传播放大,会呈几何级扩散开去,非常容易形成负面网络舆情。基于此种认识,我们认为,重大疫情各相关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造成疫情谣言生成传播的直接原因。

3. 现代媒介环境是疫情谣言传播的间接原因

与2003年“非典”疫情时期相比,现代媒介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互联网信息技术和全媒体快速发展极大拓宽了公众信息获取渠道,而网络虚拟社群则为人们情感交流、观点讨论和思想碰撞提供了便利平台。网络全媒体的强互动性、可匿

名性和广传播性无形中对疫情谣言和虚假信息生成传播提供了便捷条件,成为促进疫情谣言生成传播的间接原因。第一,网络治理水平滞后于现代媒介发展。疫情暴发后,在微信群、QQ群、朋友圈和网站社区等充斥大量“网传”“听说”“重要通知,速看!”等内容,占用了宝贵的网络资源,严重干扰公众准确获取疫情信息。“当谣言在网络环境下传播的时候,既存制度如果不能很好地予以规范,就会出现谣言横行、社会混乱的局面”,^[16]而这些谣言又具有较强的迷惑性,给公众带来强烈冲击,容易搅动人们本就紧绷的神经,形成恐慌情绪。这就要求我们要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树立网络法治思维,提高用网治网水平。第二,个别不满情绪者借机宣泄。当前,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长期积累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容易借助疫情这一危机事件暴露出来,网络的匿名性为一些群体提供了情绪宣泄渠道。在疫情暴发之际,个别不法个人或群体刻意散播谣言和虚假信息,企图引导舆论走向,制造社会恐慌,妄图“污名化”党和政府,产生恶劣影响。第三,西方势力借助网络造谣传谣。疫情暴发以来,境外敌对势力刻意利用国外网友信息不对等和对中国的无知,通过吃疫情人血馒头来制造关注点,故意夸大疫情形势、散布虚假信息,以达到其吸引舆论流量、借机抹黑中国和阻挠中国发展的险恶目的。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信口雌黄的“慷慨捐助”到美国参议员汤姆·科顿赤裸裸造谣“新冠肺炎病毒来自中国的生物战计划”等言论,充分暴露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恶毒面目和丑恶嘴脸。德国《明镜》周刊以“新型冠状病毒中国制造”的标题作为封面,“美国之音”网站和澳大利亚《先驱太阳报》以“中国病毒”来称谓“新冠肺炎”病毒,并妄称中国疫情“已经失控”,其赤裸裸制造散播恐慌、妄图抹黑中国的险恶用心不言自明,对此,我们一定要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三、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的有效治理

在听取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和有关部门关于疫情防控工作情况的汇报时,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明:“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17]在经历了“98抗洪”和“非典”疫情以后,此次新冠肺炎重大疫情是进入

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在带领全国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过程中面临的又一重大风险考验,能否有效化解和应对这一风险考验,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重大疫情防控的舆论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发挥文化的作用。”^[18]新冠肺炎重大疫情发生以来,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坚持上下联动、众志成城、英勇奋战、共克时艰,形成了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局面,展现了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同舟共济,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强大凝聚力,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实现价值引领、凝聚价值共识、整合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首先,要切实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引领作用。面对重大疫情,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做好舆论引导,唱响主旋律,对待疫情信息要坚持实事求是,对公众关切的问题迅速反馈,注重及时性、权威性和准确性,及时阻止谣言传播扩散,快速化解矛盾纠纷,营造公开透明的舆论环境。要对社会公众有针对性地开展精神文明教育,特别是注重培养公众健康保健理念,重点开展传染病相关预防控制知识宣传教育,引导公众提高文明素质,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其次,要切实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滋养作用。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面对重大疫情,要注重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重视培育民众积极健康乐观的社会心态,开展公民心理健康知识普及教育,引导人们培养自信、乐观、理性、平和的心态,对疫情防控工作增强信心。最后,要切实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支撑作用。现代社会中个体的价值认知、道德修养、知识水平和行为习惯都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作为公民个体来讲,要注重提高个人道德修养,对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理清基本的道德判断和是非标准基础上努力追求高尚的道

德情操,对不熟悉的问题不妄自议论,对不了解的事情不武断结论,对未经证实的消息不随便传播。同时,要增强自身媒介素养,明确网络媒体时代对人的基本素质的要求,提高分辨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强化个人网络文化自觉、网络道德和网络伦理自律。

2. 提高社会应急动员能力,防范化解谣言引发社会风险

与气候变暖、酸雨、土地沙化、水源食品污染、金融危机等重大社会风险相比,单纯谣言引发的社会风险似乎微乎其微,但是必须时刻警醒,我们正身处现代文明发展的“活火山”之上,“风险社会”中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蝴蝶效应”,进而导致“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悲剧,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首先,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强化风险意识,练就抵御和战胜各种风险挑战的高超本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强化风险意识,常观大势、常思大局,科学预见形势发展走势和隐藏其中的风险挑战,做到未雨绸缪。要提高风险化解能力,透过复杂现象把握本质,抓住要害、找准原因,果断决策,善于引导群众、组织群众,善于整合各方力量、科学排兵布阵,有效予以处理。”^[21]重大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正确判断疫情发展形势,未雨绸缪,科学决策,提出了“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抗疫方针,采取果断措施对武汉实行“封城”和全国联防联控等有力措施,充分彰显了党中央“统揽全局,协调八方”的能力。正是基于对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高度信任,对党和政府精准施策的充分了解,全国上下各个地区、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立即行动起来,戮力同心,共同抗“疫”,做到不断巩固成果、扩大战果,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感天动地的疫情防控人民战争。其次,要增强国家治理效能,提高政府和相关部门运行效率,提升政策执行力。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扩散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建设还存在短板和不足,特别是有些地区、部门和单位疫情防控还存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问题,缺乏对疫情形势的清醒认识,风险意识不足,防控措施落实不力。要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关键是要把党中央各项疫情防控举措抓实、抓细、抓落地,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大敌当前,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

作用,让党旗在疫情防控一线高高飘扬,做到发动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构筑起疫情防控坚固的人民防线;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坚决杜绝一切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懒政”行为,发现问题要依纪依规依法严肃处理追责问责,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纪律保证和组织保证。最后,要坚持依法治国,建立健全重大危机谣言防控体制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要依法严厉打击抗拒疫情防控、暴力伤医、制假售假、造谣传谣等破坏疫情防控的违法犯罪行为,保障社会安定有序”,“要依法做好疫情报告和发布工作,按照法定内容、程序、方式、时限及时准确报告疫情信息。”^[20]面对重大疫情中的谣言,要依法依规构建多方参与、部门联动的谣言治理新模式,找准谣言传播规律,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集聚谣言治理的强大合力;要建立有效应对谣言传播引发社会风险的体制机制,依法依规打击造谣传谣者,坚决依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面对重大疫情,政府要打“先手牌”,抢占第一话语权,积极建立新闻发布会制度,及时跟进回应公众期待、解答公众疑问、公布事实真相,确保信息发布的绝对权威。

3. 加快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提升现代媒介治理水平

首先,党委政府和宣传思想工作部门要牢牢把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加强网络媒介管控。要推动落实主体责任、主管责任、监管责任,正确引导各网络媒介运营主体守正创新,坚决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全面提升网络媒体治理能力,营造清朗网络空间。重大疫情防控中,党委宣传部门要做好宣传教育和舆

论引导,统筹网上网下、国内国际、大事小事,更好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其次,网络媒介运营主体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把握传播规律,坚持创新发展。要深入宣传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充分报道各级党委政府、各条战线开展疫情联防联控的措施和成效,生动讲述防疫抗疫的感人故事,“让群众更多知道党和政府正在做什么、还要做什么,对坚定全社会信心、战胜疫情至为关键”,“要多层次、高密度发布权威信息,正视存在的问题,回应群众的关切,增强及时性、针对性、专业性,引导群众增强信心、坚定信心,着力稳定公众情绪。”^[21]要强化对外宣传,加强国际合作,积极主动向世界各国人民讲好抗击疫情的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把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和衷共济的精神风貌充分展现出来。要大力开展国家传染病防治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宣传、解读工作,引导公众依法行事,绝不能让互联网成为谣言传播的“扩音器”和“中转站”。最后,积极发挥社会力量在疫情网络谣言治理中的作用。疫情发生以来,作为网络综合治理的参与主体,类似媒体人窦含章发起的“辟谣联盟”、腾讯较真平台等网络社群组织和互联网企业,凭借规范化的程序和专业化的素养,对谣言通过科学求证、深度解读等引导公众理性思考,发挥了很好的辟谣作用,产生了广泛影响。因此,要积极探索与网络社群组织合作交流,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谣言治理,构建由政府、新闻媒体、互联网企业、网络社群组织、网络大V等参与的共治模式,“让多元化的信息在开放的舆论场域中传播,依靠网络社团与网民的持续交流互动消除网民偏见与误解,从而消弭谣言生长土壤”。^[21]

参考文献:

- [1] 庄友刚. 资本关系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定位——从当代风险社会谈起[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8(6): 191-193.
- [2] 新华社. 习近平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N]. 人民日报, 2020-01-29(1).
- [3] 杜志强, 支少瑞. 网络政治谣言的危害及治理[J]. 中州学刊, 2019(4): 161-165.
- [4] 新华社.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部署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N]. 人民日报, 2020-02-22(1).
- [5] 李彪, 喻国明. “后真相”时代网络谣言的话语空间与传播场域研究——基于微信朋友圈 4160 条谣言的分析[J]. 新闻大学, 2018(2): 103-112.
- [6] [德] 乌尔里希·贝克, 王武龙编译. “9·11”事件后的全球风险社会[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4(2): 70-83.
- [7] 弗朗索瓦丝·勒莫. 黑寡妇——谣言的示意及传播[M]. 唐家龙,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125.

- [8] [美]奥尔波特. 谣言心理学[M]. 刘水平,等,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17.
- [9] 周裕琼. 当代中国社会的网络谣言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40.
- [10] BORDIA P, DIFONZO N. Problem Solving in Social Interactions on the Internet: Rumor as Social Cognition, Social Psychology[J]. Quarterly, 2004,87(1):33-49.
- [11] [法]古斯塔夫·勒庞.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 冯克利,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78.
- [12] 魏波. 在培育现代公民中构建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J]. 人民论坛,2020(2):28-31.
- [13] 唐兴华. 治理有关新型肺炎的谣言问题,这篇文章说清楚了! [EB/OL]. <https://mp.weixin.qq.com/s/ETgXN6HlnzlC8cxzhDdU9g>.
- [14] 郑敬斌,刘超. 重大疫情负面舆情的生成与治理[J]. 思想教育研究,2020(3):44-48.
- [15] 符晓,陈瑞莲. 恐惧与毁灭:潜意识视域下的洛夫克拉夫特小说评析[J]. 长春大学学报,2018(5):71-75.
- [16] 李景豹,代水平. 网络谣言的综合治理探析[J].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7(3):131-140.
- [17] 新华社.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形势研究加强防控工作[N]. 人民日报,2020-02-13(1).
- [18] 习近平.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N]. 人民日报,2014-02-18(1).
- [19] 习近平. 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大局稳定[N]. 人民日报,2019-01-22(1).
- [20] 李怀杰. 运用大数据提升疫情防控网络谣言治理能力[EB/OL]. 光明网—理论频道,2020-04-13. http://theory.gmw.cn/2020-04/13/content_33736545.htm.
- [21] 欧阳果华. 治理网络谣言:政府与网络社团的合作模式探析[J]. 中国行政管理,2018(4):84-90.

Research into Control of Social Risks Caused by Rumor Spreading During the Major Epidemic

ZHENG Jinpeng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China)

Abstract: In the major epidemic, the spreading of rumor dispels the leading power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destroys the social mobilization power to deal with the crisis, damages the political credibility of CPC and the government, and brings severe challenges to national governa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s of rumor generation and spread in epidemic situation.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demand is the basic reason, information asymmetry is the direct reason, and modern media environment is the indirect reason. In view of the social risk of rumor spreading in major epidemic,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governance ideas of guiding the public opinion of major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ith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improving the social emergency mobilization ability, preventing and resolving the social risk caused by rumor, accelera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prehensive network governance system and improving the level of modern media governance.

Keywords: major epidemic; rumor; social risk; national governance

(责任编辑:沈建新)